

中、朝、韩对短茎式青铜短剑研究的检视与比较

成璟璐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校人类学科, 韩国 光州, 500757)

内容摘要: 作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短茎式青铜短剑,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众多国际学者的关注, 学者们对青铜短剑的众多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 本文选择了中国、朝鲜、韩国学者对其研究的成果为对象, 对讨论比较集中的命名问题、分类问题、起源问题以及族属问题等作介绍, 同时简要分析各研究成果, 提出笔者的观点。本文还介绍了一些从新的角度对青铜短剑的研究, 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关键词: 中国, 朝鲜, 韩国, 短茎式青铜短剑, 命名, 分类, 起源, 族属,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区别于典型的中国中原式青铜短剑与北方地区的所谓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和釜柄式青铜短剑, 短茎式青铜短剑广泛分布于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地区。从这种短剑开始发现起, 就有很多学者对其相关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研究, 并且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学术问题, 在学术界深入而持续的讨论着。

本文拟从青铜短剑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入手, 对中国、朝鲜以及韩国学术界关于短茎式青铜短剑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比较, 并针对一些研究成果与结论提出一些个人的体会与认识, 以期将这个主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命名与定义

关于青铜短剑的命名问题由于是对其作出特征概括和定义描述为基础的, 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命名方式的。在中国国内, 朱贵先生在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墓葬发掘的介绍中, 对这种“奇异的青铜短剑”做了描述, 指出其“剑身很短, 圆脊起棱, 两叶刃部中间凹曲, 剑柄部装有一个较重的金属矿石制成细腰型的枕状物, 以手握之逆刺很有力”¹。显然是比照典型的中原式青铜短剑对其作的定义与描述。而在1961年十二台营子墓葬被金元龙先生介绍到韩国的时候, 直接对其作了“细形铜剑”的命名, 只不过在叙述的时候提到“剑身上半部细身锐利, 下半部广大的型式应该是这种剑的本来型式, 在韩国发现的大量剑身上下基本一致的短剑是其后期型式”², 因为在此之前, 韩国和日本发现了大量后来被韩国学者命名为“细形铜剑”的青铜短剑, 并且在早期的型式分类中, 类似的短剑被日本学者区分成中广型短剑而晚于典型的细形铜剑, 金元龙先生对照这种短剑对十二台营子的短剑作了描述, 尽管现在看来其定义略失妥当, 但正是在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这种型式的短剑早于韩国的细形铜剑, 为以后青铜短剑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时间框架。

此后, 中国国内短茎式青铜短剑屡有发现, 早在六十年代, 孙守道和徐秉琨就在发掘简报中称其为“丁字形青铜短剑”³, 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展开的。这一时期, 乌恩和靳枫毅、迟雷将其命名为“曲刃青铜短剑”⁴, 当然, 靳枫毅的曲刃青铜短剑概念范围远远不止短茎式, 还包括有匕首式短剑和釜柄式短剑; 林沅将其命名为“东北系

青铜短剑”⁵，徐光辉赞成林沅的命名⁶；王成生将其命名为“短铤曲刃青铜短剑”⁷；翟德芳称其为“北方地区青铜短剑东群”⁸；王建新在论文中提到“东北亚系青铜短剑”和“短茎组合柄型青铜剑”两个名称⁹。在朝鲜，基本上比较统一，学者们使用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的¹⁰概念。而在韩国，命名与分类几乎是紧密联系的，针对剑身的不同形态，开始是沿用日本学者提出的“满州式铜剑”这一名称，但很快就改称“辽宁式铜剑”以及“韩国式铜剑”或者“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李健茂使用“辽宁式铜剑”和“韩国式铜剑”的命名¹¹，李康承稍有区别，他在论文中使用“辽宁式铜剑”和“细形铜剑”¹²两个概念；而如李清圭¹³，李荣文¹⁴，吴江原¹⁵，赵镇先¹⁶等更多的学者使用“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的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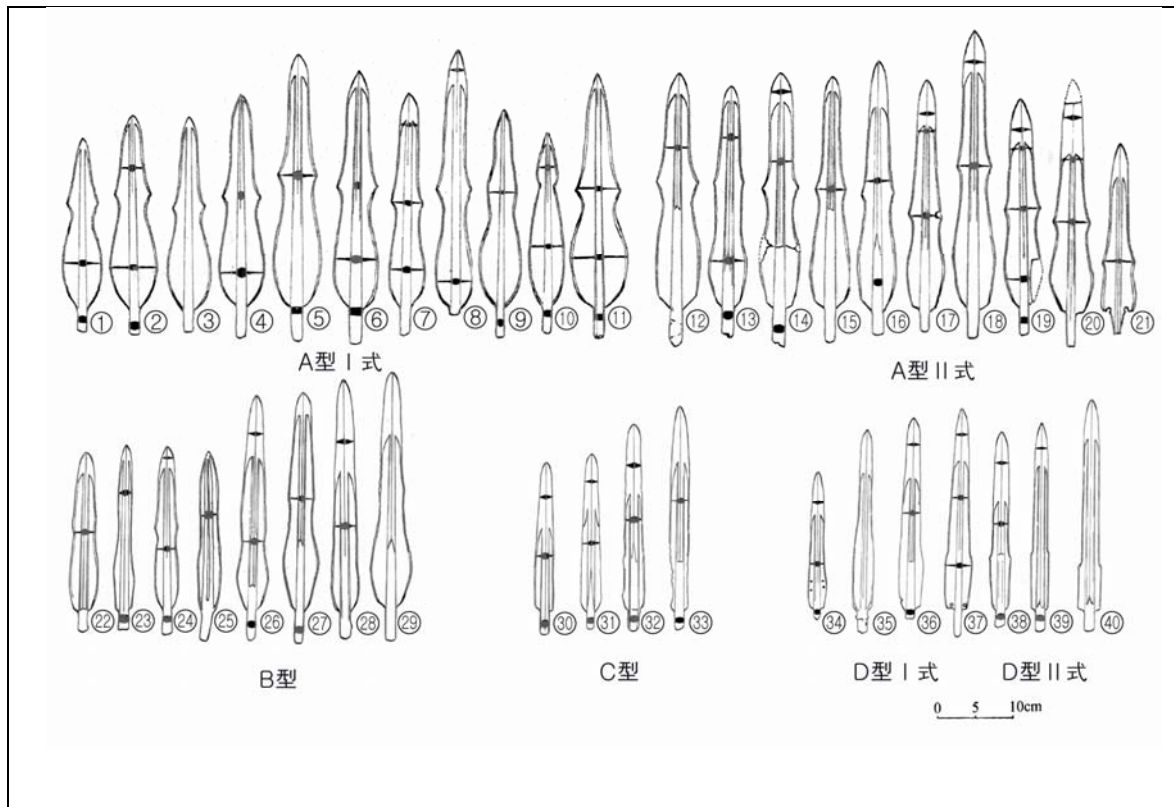
以上学者们对短茎式铜剑的命名大体着眼于两方面，即铜剑的形态与分布地域。短茎式铜剑在中国主要与中原式铜剑、鄂尔多斯式铜剑以及釜柄式铜剑相区分，其主要的特征很多学者都各有总结和归纳。如果考虑到韩国和日本存在的更多的是所谓的细形铜剑，那么用带有“曲刃”的名称去命名这种短剑就显得有点局限，即使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有相当“直刃化”的铜剑，当然，如果忽视两类短剑的联系，单纯针对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大多数刃部呈波浪状的铜剑的话，似乎还有一些道理。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的命名抓住了广泛存在于东北亚地区该类铜剑的形态特征，但是过于强调二者的区别，对二者联系考虑的较少。而以地域来命名都或多或少的对这一铜剑文化的分布范围进行了不太准确的界定，并且文化的分布与现在行政区划多有误差，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虽然和中原式铜剑以及鄂尔多斯式铜剑的命名比起来，也应该从地名角度对其命名，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很准确地找到一个适合这一文化的地理名词来命名它。

我们认为，如果将中原式短剑的特征概括为直刃连柄式，鄂尔多斯式短剑的特征概括为匕首式，同时考虑到大量釜柄式短剑，将这种短剑命名为短茎式铜剑可以避免以上一些争议。这种命名不但考虑了与其他系统短剑形态上的区别，更强调这种铜剑系统内部的联系，并且也比较简明。为了不引起概念的混淆，我们最后建议使用琵琶形短茎铜剑与细形短茎铜剑这样的命名。

二、型式分类

对于短茎式铜剑的型式分类，中国学者最早作此项研究的应该是孙守道和徐秉琨先生，他们在对辽宁寺儿堡等地出土的铜剑作了介绍以后，还作了进一步的简单分类，当时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柄部的质地以及锋部的长短¹⁷。此后，分类研究的代表研究者有林沅、靳枫毅和王建新。

林沅先生曾两次著文讨论青铜短剑（为了叙述方便，分别简称为《初论》和《再论》）¹⁸，在《初论》中首先将剑身有节结（尖突）和脊突（隆节）的铜剑称为A型，在A型中又按照节结和脊突的明显程度、铜剑长宽比、锋部的有无和长短将其细分为三式，后来在《再论》中又重新按照铜剑基部的形态将A型铜剑细分为两大式；在《初论》中将A型以外的铜剑分为B、C两大地方变体形式，但在《再论》中，重新将其细分为B、C、D三种型式，其中B型的特征是脊突消失，节结成为弧突并且弯度很小，整个刃部成束腰状；在B型中两侧刃部都是平直的铜剑被划分为C型；而前段刃部平直，后段有明显突出部的前窄后宽型铜剑划分为D型，D型剑中按照剑身下段突出部转角的形式又分为弧形转角的I式与折线形转角的II式。《再论》中的型式分类举例参见图一。现在看来，在型的区分中所掌握的分类标准基本应该是准确的，《再论》中重新界定的标准明显比《初论》中提出的标准更为合理。事实上，李荣文对韩国出土琵琶形铜剑和赵镇先对韩国出土细形铜剑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类标准中也有基部角度这一要素¹⁹。



A型	I式	1、抚顺甲帮 2、辽阳二道河子 3、磐石小西山 4、旅大刘家疃 5、朝阳十二台营子6、建平大拉罕沟 7、建平采集1号 8、伊敏河矿区 9、旅大楼上M6 10、新金（今普兰店）双房 11、清道郡礼田洞
	II式	12、朝阳十二台营子 13、沈阳郑家洼子 14、沈阳郑家洼子 15、喀左桃花池 16、喀左南洞沟 17、凌源（20号）18、北票何家沟 19、建平老窝卜 20、凌源三道河子 21、海参崴博物馆
B型		22、金县卧龙泉 23、长海上马石M2 24、抚顺针织一厂 25、旅顺楼上M1 26、建平采集2号 27、锦西寺儿堡 28、新城高碑店 29、凌源三官甸
C型		30、新城高碑店 31、本溪梁家村 32、旅大尹家村 33、凤城小陈家
D型	I式	34、桦甸西荒山屯 35、双辽吉祥屯 36、宽甸赵家堡 37、怀德大青山
	II式	38、东沟大房身 39、集安五道沟门 40、昌图翟家村

图一：林沅先生《再论》中的型式分类举例

前文已经提过靳枫毅先生定义的“曲刃青铜短剑”远远不止短茎式一种，短茎式曲刃青铜短剑不过是其分类系统中的B型剑，而A型是曲刃銎柄式青铜短剑，C型是曲刃匕首式青铜短剑²⁰。关于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也注意到其整体形态、锋部长短、节结突出的程度与位置、节结角、血槽位置、脊突隆起程度、柱脊的研磨、脊棱线的中止位置、剑身基部形态以及剑身角等要素。按照这些要素的变化将辽西地区的曲刃短茎式铜剑分为7式，并对曲刃短茎式铜剑的变化趋势作了表述，指出这种变化规律适用于出土这种青铜短剑的各个文化区。我们注意到，这些分类标准中有的属于连续性属性，有的属于非连续性属性，如果能够区分这两类属性并结合一些统计方法对曲刃短茎式铜剑作型式分类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其他学者对其某些分类标准的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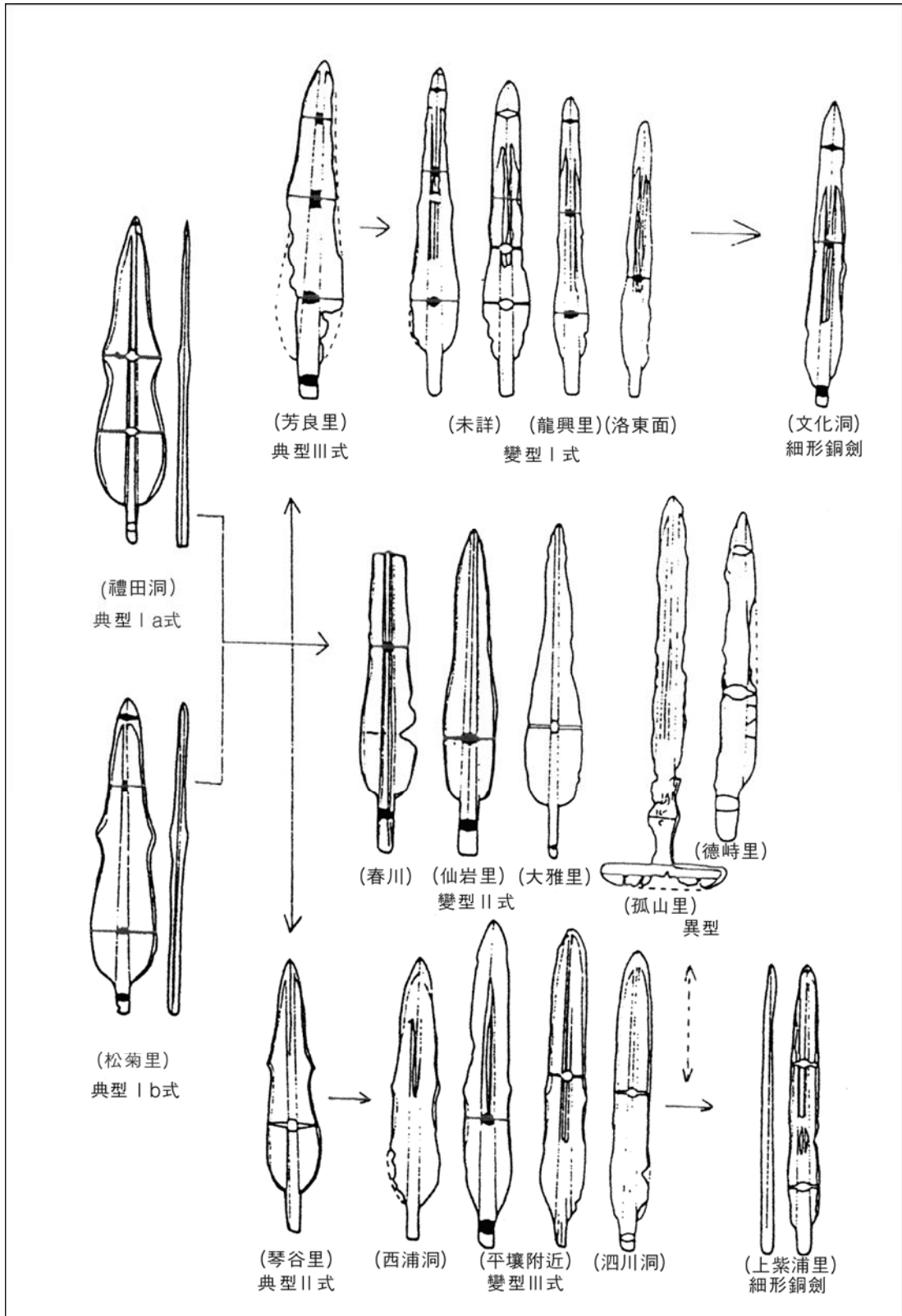
王建新先生的首要分类基准是铜剑的功能，将这类铜剑分成实战用的兵器和非实战用的明器或祭器两大类，然后指出由于分布地域、时代和文化系统的不同，将铜剑的剑身分为细长型曲刃型、宽短曲刃型、细形、中细形、中广形、平形等不同型式，在此之下，再按照地域、文化因素和制作技法分出了一些亚型²¹。这篇论文中将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铜剑加以详细的考虑分析是正确的，但很明显，该方案在型与亚型的分类标准上有些重复，而对铜剑功能只是根据一些铸型的属性加以判断，将只在锋部和剑身前半段研磨的铜剑判断为没有实用功能的明器或祭器，值得商榷。

朝鲜学者对短茎式铜剑的类型也就也是按照琵琶形短剑与细形短剑分别进行的。对于琵琶形铜剑，按照剑身形态、剑身长度、剑把的材料将铜剑分了三类，第一种，剑身较短，隆起部与突起部比较明显，血槽从剑缘开始，没有剑把的形式（即木质剑把）。这种铜剑经常与美松里式陶罐伴出；第二种，隆起部与突起部还比较明显但与第一种铜剑相比较剑身相对较长，血槽位于剑缘稍微往下的地方；第三种，隆起部与突起部不甚明显，剑身很长，血槽的位置下降了很多。这类铜剑往往与青铜剑柄有共存关系²²。对于细形铜剑则主要是依照剑身长度、锋部长度以及脊棱线的终止位置等进行分类的²³，现在看起来，这些分类标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韩国学术界对短茎式青铜短剑的各种分类方案中，尹武炳先生是将短茎式青铜短剑作为整体研究分类的，而更多的学者的基本上是按照“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分开研究的。琵琶形铜剑的代表性研究者主要有李荣文、姜仁旭、吴江原，细形铜剑的代表性研究者主要有李清圭、赵镇先。

尹武炳先生分类方案中的第一类是指剑身中央具有显著的柱脊、剑身平面下半扁平宽大并且呈特殊的弯曲状特点的铜剑，其实也就是其他学者所称的琵琶形铜剑。第二类和第三类青铜短剑的区分标准是脊棱线的中止位置，脊棱线在不到执入部（中国考古文献多称节间束腰）中止的是第二类，脊棱线超过执入部中止为第三类。同时又根据第二类和第三类锋部的长度细分为a、b两式，a式的锋部较短，b式的锋部较长。尹武炳的分类方案还进一步论述了短茎式青铜短剑的发展变化，其演变趋势是由琵琶形铜剑向细形铜剑发展；细形铜剑的变化是中脊棱线逐渐延长和锋部的长大化²⁴。

李荣文先生以朝鲜半岛的琵琶形铜剑为研究对象，根据铜剑的形态和属性分为典型与变型两大类，并且以柱脊的剖面形态和突起角与剑身基角的差异作为分类标准，分别将典型与变型琵琶形铜剑各分为三式。进而又将典型I式琵琶形铜剑根据茎部是否有豁口分成a、b两式，并指出茎部有豁口的短茎式琵琶形铜剑只在朝鲜半岛出现，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标志。至于那些脱离琵琶形铜剑属性又不表现细形铜剑特征的特殊铜剑则被单独划分出来，称异型铜剑²⁵（图一）。



图二：李荣文揭示的琵琶形短茎铜剑变迁图

这个分类方案的根据是铜剑出土遗迹与共伴遗物，基于琵琶形铜剑先于细形铜剑的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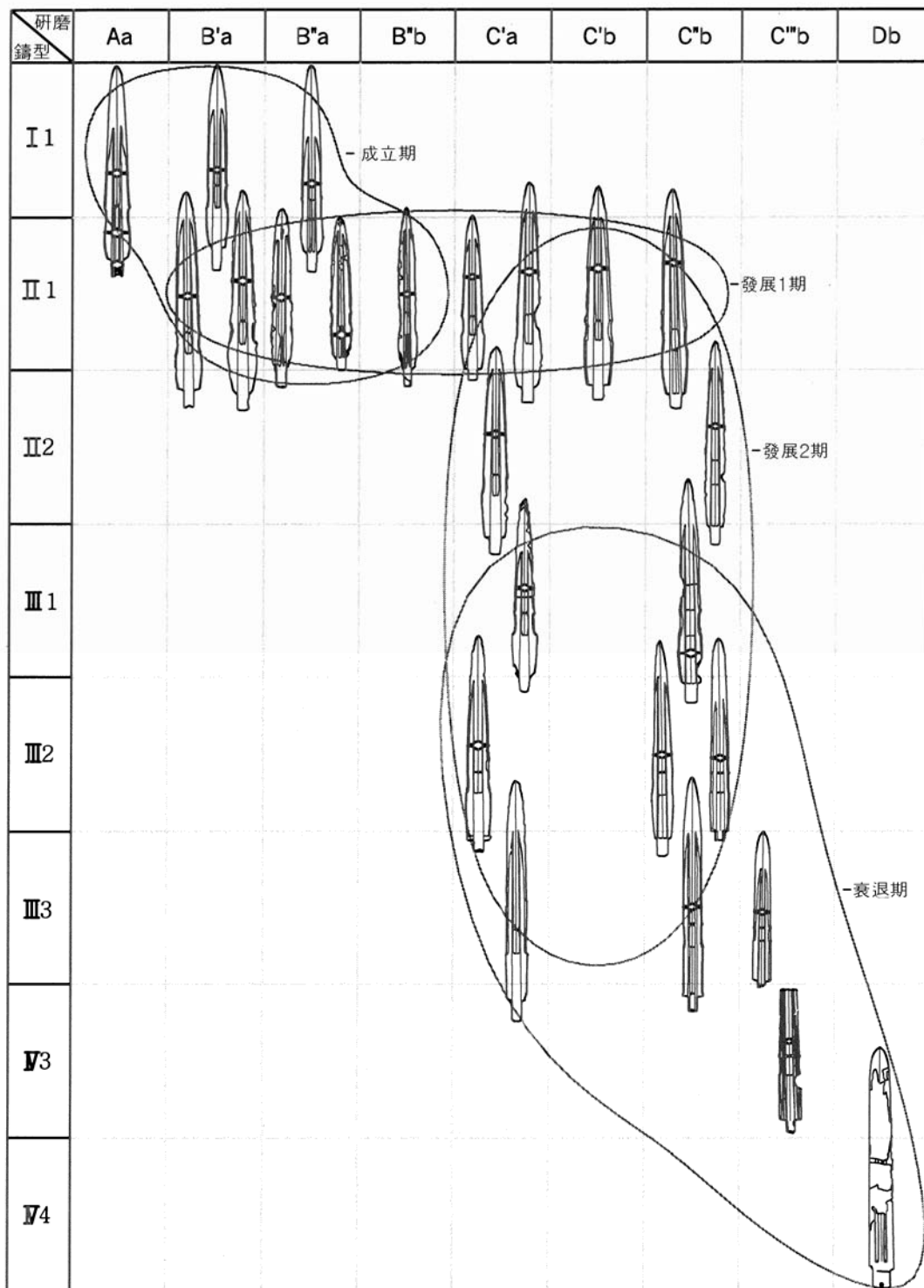
识，琵琶形铜剑从典型到变型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短茎式铜剑细长化的过程，这个变化趋势的分析在后来的细形铜剑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

姜仁旭先生在研究琵琶形铜剑的时候，比较早的使用了统计学的一些方法²⁶。首先将众多铜剑的可变属性一一加以分析，归纳出4个非连续性属性（突起部的有无、脊突的有无、刃部的形态、剑身后半是否有突出）和6个连续性属性（剑身长度、剑身宽度、锋部长度、突起部的位置、突起部的角度、剑身基部的角度），然后对除了剑身长度以外的5个连续性属性作了相关的统计学分析。分析结果，以突起部与脊突的有无为第一分类基准，将铜剑分为I、II两式，其中I式中又按照铜剑的长宽比将其分为Ia、Ib、Ic三式；II式以剑身下半部突出部的有无为标准分为IIa、IIb两种形式。再次以锋部的形成为基准，细分为IIa1、IIa2、IIb1、IIb2四种型式。我们认为，应用统计学的方法设定分类标准是应该肯定的。

吴江原先生在考虑琵琶形铜剑分类基准的时候，采用了2组比例，以突起部宽度比束腰部宽度的比例（隆起比）为第一基准，以铜剑剑身长度与剑身下半部最大宽度的比例（长宽比）为第二基准。同时在对这两个比例对应关系的统计学分析之前，考虑到几件突起部的位置相当靠前的特殊品，在长宽比和隆起比的比例分析表中可以看到其明显而独特的分布状况，所以首先将这些短剑划为B类。其余的短剑也按照长宽比和隆起比的比例的组合状况分成A I、A II、A III三类。对于B类铜剑，则通过长宽比和突起位置的比例分析，按照其组合状况分成B I、B II、B III三类。对于为数不多没有隆起部的铜剑命名为中细形铜剑，并对它们也作了分类研究。首先按照剑身下段部的形态分为A型（圆弧）、B型（圆折或直折）、C型（直线状），然后再根据三型不同的细部特征各分为2式，即A I（喀左老爷庙组）、A II（本溪刘家哨组）、B I（怀德大青山组）、B II（集安五道岭沟门组）、C I（大连尹家村组）、C II（沈阳郑家洼子组）六种型式²⁷。

李清圭先生在研究朝鲜半岛细形铜剑时，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的显著差异，并指出细形铜剑的各属性当中，能反应时间变化的属性有脊棱线的长度、剑身的下部形态、剑身宽度、抉入部的形态以及血沟的有无。这些属性有的是非连续性属性，有的是连续性属性。细形铜剑分类第一基准是脊棱线的长度，第二基准是剑身的下部形态以及血沟的有无。据此，将短茎式铜剑除了A式（琵琶形铜剑）以外进一步分为B I式、B II式、B III式、B III'式、B IV式以及B IV'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存遗物，进行了分期研究²⁸。该分类方案基本上构建了细形铜剑的分类基础，虽然后来有学者对此方案提出了改进意见，但是对型式划分所选择的标准还是一致的。

赵镇先先生首先分析了铜剑在铸造、研磨、使用以及埋葬等过程中各个属性的变化情况，根据铜剑的锋部长短，血沟与血槽的有无、下段部的形态、剑刃与研磨角、脊棱线与节带、剑身宽度、抉入部等各个属性的差异，将它们分为铸型属性和研磨属性，并进行分类组合研究。分析各个形式的存续时间，变迁过程²⁹。赵镇先揭示的细形铜剑型式分类及变迁图参见图二。与李清圭的分类方案相比较，赵镇先的分类方案与尹武炳所揭示的方案更为相似，二者都强调锋部长短在型式变迁中的重要标识。



图三：赵镇先揭示的细形短茎铜剑型式分类及变迁

三、起源问题

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这种短茎式铜剑的起源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话题，但是由于所持的论据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是互不一致的。目前大体有“西伯利亚起源说”、“辽

西起源说”与“辽东起源说”三种意见。

持“西伯利亚起源说”的学者主要是韩国的金廷鹤先生。金廷鹤在其论文中指出，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以及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是与辽宁地区紧密联系的，而辽宁地区的青铜器文化则是源于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夫文化以及卡拉苏克等青铜器文化。其代表的青铜器是青铜短剑、曲背内弯刃刀子、铜泡、扇形刃釜斧和联珠形铜饰³⁰。这种观点过于笼统，我们前文已经指出，短茎式铜剑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铜剑文化是有区别的，不仅是分布的地域，包括文化内涵也不一样。而在朝鲜半岛青铜文化后期，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青铜短剑、青铜镜与曲玉为组合的内容，同样与鄂尔多斯和更为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在看待这种观点的时候，正如李清圭所指出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个别的器物来分析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的起源，显然是很困难的³¹。

持辽西起源说的学者比较多，主要有靳枫毅、王成生、吴江原、姜仁旭等。靳枫毅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各项统计、比较结果一致表明：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曲刃青铜短剑种类、数量最多，分布在为密集，出现的时间最早，型式最丰富，工艺质量最高，消失的时间相对较早，这些其他任何地区（沈阳、辽东、吉长）是不能比拟的”，又根据辽西地区出土的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的石范指出早期型制的铜剑确系当地所铸。辽西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可以早到西周³²。王成生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辽东地区青铜短剑的存续时间大约是春秋中期前后到战国晚期或汉初，而辽西地区的青铜短剑则开始于西周中期沿用至战国中期”。同时又分析辽西的青铜短剑是在燕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地方特点的短剑文化，这种文化后来逐渐影响到辽东、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及俄罗斯滨海地区³³。吴江原博士认为，琵琶形铜剑文化是公元前10世纪后半到9世纪左右，在努鲁尔虎山以南的大凌河上游到老虎山河以西的辽西地区（凌源北部-建平南部）成立发展起来的，后来首先向邻近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圈和河北省北部地区以及下辽河流域传播，再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按照辽东北部-辽东南部-辽东南端传播的³⁴。姜仁旭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再次谈到了有关琵琶形铜剑起源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琵琶形铜剑应该起源于渤海湾地区的十二台营子文化，辽宁喀左和尚沟遗址所出的青铜短剑应该是最早的铜剑类型。关于十二台营子文化，北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接，东与辽东石棺墓文化相邻，主要以辽宁省西部的喀左和朝阳为中心。该文化之前，这个地区是以中原式礼器窖藏和木椁墓为代表的魏营子文化。十二台营子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公元前10世纪末到公元前9世纪初。姜氏认为持辽东说的学者无法证明在垂腹钵口壶（美松里式陶器）的早期阶段已经出现了青铜短剑，所以，垂腹钵口壶的年代可以往前推算，但是没有证据可以同时将青铜短剑的年代往前推。该文还讨论了有关琵琶形铜剑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途径，目前至少可以在朝鲜半岛区分出三大类琵琶形铜剑，以西北朝鲜平壤一带为中心分布区的西浦洞式铜剑类型是从渤海湾经丹东地区传入的；仙岩里式铜剑类型是受当地角形陶器文化中有茎式石剑的影响而产生的；礼田洞式铜剑类型是辽西地区的铜剑经辽东半岛而流入朝鲜半岛南部的³⁵。姜氏的观点值得注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对辽宁地区地理单元的划分有自己的见解，这也许是很多学者在讨论青铜短剑问题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相对于辽西起源说，也有不少人支持辽东起源说，代表研究者有林沅、翟德芳、朱永刚、徐光辉以及一些朝鲜学者等。林沅先生在《初论》中对铜剑的具体年代检讨时注意到了刘家疃石墓中的共伴遗物，据共伴的铜剑推测最早的A型I式剑身出现于西周的可能性比出现于春秋初的可能性要大。该文运用类型学的方法证明长宽比最小前后比最大的辽阳二道河子铜剑是当时已知材料中最早的型式。此后发表的《再论》一文，林先生根据共伴遗物指出就当时的材料看来，形态最早的铜剑还应该只在辽东地区和吉长地区，并再一次对辽西起源说进行了驳斥³⁶。朱凤瀚先生也赞成辽东和吉长地区的短锋型铜剑是东北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型式，但同时指出这两个地区未必是原生地³⁷，但对于铜剑的起源问题没有进行讨论。翟德芳先生从类型学的基本原理和铜剑的共伴遗物两方面分析指出曲刃短茎式剑是产生于以清

原、西丰、辽阳等地为中心的辽东地区，此后向北分布到西团山文化区内，西传至辽西地区，并流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即热河山地一带³⁸。但这种观点受到韩国姜仁旭先生的质疑，姜仁旭认为翟氏的观点等于是强调琵琶形铜剑辽东地区自生说，但是对其理由的叙述中着重强调的是该地区铜剑在型式学上的原始性，证据显然不充分³⁹。朱永刚先生在讨论青铜短剑年代的时候，不仅考虑到类型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分析了辽东地区与“短型剑”共伴的垂腹型钵口壶应该流行于西周晚或春秋早期以前，而其基本造型和纹饰则在双坨子三期有所表现，所以进一步推测其年代可能会早到西周中期。相反，大、小凌河流域出现的青铜短剑，年代大约是西周晚到春秋早期，由此判断青铜短剑应该起源于辽东地区，并由东向西传布，最迟至西周晚期在大小凌河流域形成新的铸剑业中心⁴⁰。徐光辉先生专门著文讨论青铜短剑的起源问题，着重分析了辽东地区与铜剑共伴的钵口壶（韩国考古文献中多称之为美松里陶器）和吉长地区星星哨遗址的墓葬出土的陶器，指出青铜短剑首先发生于辽东地区，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向辽西地区和朝鲜半岛扩展，并有可能先此进入松花江流域；不过后来反而又受到辽西地区同型剑的影响，反映出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⁴¹。

除此之外，韩国学者对细形铜剑的起源也作了一些分析研究，基本上有两种意见，李荣文等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的细形铜剑是在原来的琵琶形铜剑文化基础上产生发展的⁴²；李鍾宣则主张将两种短茎式铜剑文化区分为斯基泰系游牧文化南进的鄂尔多斯-西北朝鲜系统与辽东-西南朝鲜系统的二元说⁴³。关于具体的起源地区，李健茂先生在其研究论文中不仅坚持韩国式铜剑文化辽西地区起源说的观点，还进一步通过分析指出了该文化的传播路径，即属于韩国式铜剑文化所包含的墓制、房址、粘土带陶器（中国考古文献中常表述为叠唇罐）、多钮粗文镜、青铜短剑等诸要素是从朝阳、沈阳、辽阳、本溪一带，经辽东半岛南端，通过海路到达韩国京畿道以南的地区⁴⁴。另一位韩国学者朴淳发在其论文中以韩国青铜器文化的重要要素粘土带陶器为研究对象，对辽宁地区的这种陶器向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作了分析，按照其推测，应该是两条传播路线，一条是经过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海路，另一条是经辽中-辽北-鸭绿江流域-清川江流域-元山湾的陆路⁴⁵。上述观点虽众说纷纭，但对这一国际地区性学术课题的探讨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从短茎式铜剑的存续时间与分布范围来看，目前的考古材料还很难充分的证明是某一地区单线起源并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在当时那样一个冲突纷争的社会，武器一定是尖端技术的体现，频繁战争、边境的贸易与互相的礼物馈赠都可能导致集团之间这种技术的交流。另外，近来有报导，在山东半岛北部的栖霞等地也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琵琶形短茎青铜剑⁴⁶，所以我们只能期待有新的考古发现，并通过对短茎式铜剑的型式分类趋于合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

四、有关族属的推测

考古学的魅力在于透物见人，很多学者都希望通过短茎式青铜短剑的研究来分析探讨创造、拥有这种文化的古代先民。目前学术界关于短茎式青铜短剑族属的研究有东胡说，古朝鲜说以及多民族共有说等多种学术观点。

东胡说是最早提出的观点。十二台营子发掘报告指出该类短剑可能是东胡族的遗物，这种观点在较长时间内颇具影响。韩国李康承先生也在其论文中比较研究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所谓辽宁式铜剑文化，指出二者分别是属于山戎和东胡⁴⁷。靳枫毅先生曾比较系统的论述了包含曲刃短剑遗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属于东胡族。但这个观点随着近些年新资料的刊布和研究的深入被质疑。首先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界定，很多学者注意到努鲁尔虎山以西地区与大、小凌河流域的青铜短剑墓葬的区别，不再把大、小凌河流域晚于魏营子类型的青铜文化遗存当作单纯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来看待⁴⁸。林运先生首先通过对文献、考古学文化、

人种学资料等多方面的比对分析,排除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东胡的可能。指出燕长城以南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燕文化之间的间歇期,正预示着有一批确实实的东胡遗存有待发现和研⁴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近年来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林西井沟子遗址的发掘和整理,通过对其时空框架、经济类型、埋葬习俗以及人种学的分析,为探讨东胡族遗存提供了新线索⁵⁰。由于井沟子遗址出土的圆凸格直刃青铜短剑与扁茎直刃短剑,与短茎式青铜短剑是属于两个系统的短剑,如果把这些与短茎式青铜短剑风格迥异的青铜短剑代表的遗存看成是东胡族的话,那么使用短茎式青铜短剑的人群则应该是东胡族之外的其他族团所拥有。

持古朝鲜说观点的大部分是朝鲜的学者,韩国也有一部分学者赞同这一观点。朝鲜学者主张十二台营子类型的居民是发人,发人则是古朝鲜民族的一部分⁵¹。韩国学者金廷鹤先生在其论文中将辽宁青铜器文化分成了几部分,其中从大、小凌河流域十二台营子遗址出土的铜剑型式以及共存遗物来看,应该是属于年代最早的,并将其命名为“朝阳文化”。金氏认为“朝阳文化”是古朝鲜形成的重要环节⁵²。不过这种观点远不及“东胡说”在韩国有影响。

持多民族共有说的学者比较多,林沅先生最早在《初论》中指出东北系铜剑所分布的范围为秽貊、真番、朝鲜所占据⁵³。朱永刚先生对照汉魏文献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将战国以后的东北系青铜短剑文化(群)分成了南北两支,其中南支短剑群属貊的活动区域,北支短剑群则可能包容了真番、秽、高句丽和朝鲜等多个历史民族或其祖先⁵⁴。我们赞成这一观点,因为单从短茎式青铜短剑的分布范围来看,并非与文献记载的某一单一民族所吻合的,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区域。如何将这些古代民族区分开来,恐怕仅仅依靠短茎式青铜短剑是有困难的。相反,如果对这个区域内的住居形式、葬制、陶器、石器地开展多方面的整合研究,或许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短茎式青铜短剑,中韩学者还在其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吴江原先生对包括青铜短剑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青铜器的制作与熔范的研究⁵⁵,赵镇先先生对韩国出土的细形铜剑制作与机能变迁的研究⁵⁶。毫无疑问,他们的努力拓展了短茎式青铜短剑研究的新视野。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共同推进短茎式青铜短剑跨越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新进展。

参考文献:

- [1]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J].考古学报.1960(1):63~71.
- [2] 金元龙.十二台营子的青铜短剑墓[J].(韩)历史学报16.1961:109~121.
- [3] 孙守道、徐秉琨.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J].考古.1964(6):277~285.
- [4] a乌恩.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短剑[J].考古学报.1978(5):324~333. b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汉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下)[J].考古学报.1982(4):387~426、1983(1):39~54. c迟雷.关于曲刃青铜短剑的若干问题.考古[J].1982(1):54~59.
- [5] 林沅.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J].考古学报.1980(2):139~161.
- [6] 徐光辉.论中国东北系铜剑的起源问题——以辽东地区的考古学资料为中心[A].边疆考古研究(一)[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67~75.
- [7] 王成生.东北亚地区短茎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与族属[A].辽宁考古文集[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193 ~ 216.

[8] 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J].考古学报.1988(3):277~299.

[9] 王建新.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演剧[J].考古学报.2002(2):175~201.

[10] a郑燦永.细形铜剑的形态与其变迁[J].文化遗产.1962(3):19~44. b朴镇煜.对于琵琶形短剑的发源地与创造者[A].关于琵琶形短剑文化的研究[C].1987.5~92. c黄基德.辽西地区琵琶形短剑文化与居民[A].关于琵琶形短剑文化的研究[C].1987.93~150.

[11] a李健茂.韩国的辽宁式铜剑文化[A].韩国的青铜器文化[C].首尔:汎友社,1992.126~132. b李健茂.韩国式铜剑文化[A].韩国的青铜器文化[C].首尔:汎友社,1992.133~137. c李健茂.韩国式铜剑文化的性质—对于其成立背景[A].东亚细亚青铜器文化—通过遗物看社会状况[C].首尔: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94.155~182.

[12] 李康承.辽宁地方的青铜器文化—通过青铜遗物看辽宁铜剑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比较研究[J].韩国考古学报(6).1979:1~95.

[13] 李清圭.对于细形铜剑的型式分类及其变迁[J].韩国考古学报(13).1982.1~37.

[14] a李荣文.韩半岛出土琵琶形铜剑形式分类试论[J].(韩)博物馆纪要(7).1991:61~110. b李荣文.对于韩国琵琶形铜剑文化的考察—以琵琶形铜剑为中心[J].韩国考古学报(38).1998:63~104.

[15] 吴江原.琵琶形铜剑文化的成立于展开过程研究[D].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

[16] 赵镇先.对韩国琵琶形铜剑与细形铜剑的关系的一考察[D].全北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1997.

[17] 同注[3].

[18] a同注[5]. b林泫.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A].考古学文化论集(四)[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34~250.

[19] a同注[13]. b赵镇先.细形铜剑文化的研究[M].首尔:学研文化社.2005.

[20] 同注[4]b.

[21] 同注[9].

[22] 同注[10]b.

[23] 同注[10]a.

[24] 尹武炳.韩国青铜短剑的型式分类[J].震檀学报(29·30).首尔:震檀学会,1966.237~246.

[25] 同注[13].

[26] 姜仁旭.对于辽宁地域琵琶形铜剑的一考察[J].韩国上古史学报(21).1996:173~247.

[27] 同注[14].

[28] 同注[12].

[29] a赵镇先.细形铜剑的型式变迁与意味[J].韩国考古学报(45).2001:75~100. b同注[18]b.

[30] 金廷鹤.韩国民族及文化的起源[M].韩国上古史研究.首尔:汎友社,1990.77~146.

[31] 李清圭.辽宁地方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J].(韩)博物馆纪要(7).1991:47~59.

- [32] 同注[4]b.
- [33] 王成生.概述近年辽宁新见青铜短剑[J].辽海文物学刊.1991(1): 74~81.
- [34] 同注[14].
- [35] 姜仁旭.对于韩半岛出土琵琶形铜剑的登场与地域性[J].韩国上古史学报(49).2005: 59~98.
- [36] 同注[17]a.和b.
- [37] 朱凤瀚.论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出土的短茎曲刃青铜短剑[A].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C].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162~179.
- [38] 同注[8].
- [39] 同注[23].
- [40] 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J].考古学报.1998(2): 133~151.
- [41] 同注[6].
- [42] 同注[13]a.
- [43] 李鍾宣.细形铜剑文化地域的特征[J].韩国上古史学报(3).1990: 144~177.
- [44] 同注[10]c.
- [45] 朴淳发.辽宁粘土带土器文化的韩半岛定着过程[J].(韩)锦江考古(创刊号).2004: 37~63.
- [46] 据王青先生讲演内容, 论文待刊.
- [48] 同注[11].
- [49] a同注[30].b卜箕大.凌河文化.辽西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文化研究[M].首尔:白山资料院, 2002.219~263.
- [50] 林沅.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A].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174~181.
- [51] 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与文物, 2004, (1):6~19. b朱泓.东胡人种考[J].文物, 2006(8):75~77.
- [52] 同注[10]c.
- [53] 金廷鹤.从考古学上看古朝鲜.韩国上古史的诸问题[M].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67~96.
- [54] 同注[5].
- [55] 同注[38].
- [57] 吴江原.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器制作与熔范[A].韩国的青铜器制作与熔范-韩国崇实大学校博物馆第二回纪念讲座发表要旨[C].2005.9~86.
- [58] 赵镇先.细形铜剑的制作与机能变迁[J].(韩)湖南考古学报(13).2001: 33~64.

Several Issues on researches of the short stem type bronze daggers ---Focused on Chinese D.P.R.Korean and R.O.Korean research papers

Cheng Jing-tang

Abstract: The short stem type bronze dagger, which has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s and imprint of time, has always been the discussing focus of many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ose from China, D.P.R.Korea and R.O.Korea. These researchers analyzes and discusses about bronze daggers on lots of questions. To improve researches on such topic, this paper aims at achievements those 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Korea has already gotten, and introduces issues on naming,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race. Meanwhile, makes brief analysis on each achievement, and then raises the author's own point.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ome researches of bronze daggers on several new angles to hope it c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by academe.

Key word: China, D.P.R.Korea, R.O.Korea, the short stem type bronze dagger, the naming, the classification, the origin, the race

投稿日期: 2006-06-19

作者简介: 成璟塘 (1978年11月-), 男, 汉族, 山西平遥人。 指导教师: 林永珍教授,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 校人类学科